

張壽鏞之《詩經》學

魏鴻鈞*

摘要

張壽鏞先生（1876-1945A.D.）之於五經，嘗有「惟《詩經》最熟」之語。其 1942 年出版之《詩史初稿》16 卷，迄今尚未有相關評論，本文不揣淺陋，試從時代背景、著作體例、解經方式以及《詩經》學觀等方面，探討張氏於《詩經》研究上的貢獻和侷限。我們了解《詩史初稿》之所以「遵序」、「宗毛」、「依譜」，其背後動機，在維持漢儒以降所賦予《詩經》的權威性及道德性，此與張氏的家學淵源及身處浙東學派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同時代如：郭沫若、鄭振鐸、張西堂等人，皆曾對〈詩序〉提出質疑和反對，然而張氏或視而不見，或雖見仍一意孤行，在軍閥割據、外敵環伺，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以前，張氏選擇維護禮教、鞏固〈詩序〉的聖王教化觀，實有其不得已之處。

關鍵字：張壽鏞、詩史初稿、詩序、毛詩、浙東學派。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博士生

The “ Shih Jing” theory ---- Shou-Yung Chang

"Wei Hongjun"

Abstract

In “ Five Classes”, Mr. Shou-Yung Chang (1876~1945A.D.) had the saying, “ I am much familiar with Shih Jing”. Even now, there are still no comments on the 16 books of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 of Shih Jing, published in 1942.. Therefore, the same, no comments on them in the study, instead, the study is to treat Mr. Chang’s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to the research of “Shih Jing” thr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egetical method, book style, and the learning concept of “Shih Jing”. In which, we can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why”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 of Shih Jing” is based on “Zun Xu”, “Zong Mao”, and “Yi Pu”, and the motive behind it is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and morality given to “Shih Jing” by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Mr. Chang’s family history and his academic background as a Che-Tung historian. The contemporaries, such as Mo-Ruo Guo, Zhen-Yi Zheng, Xi-Tang Zhang, all raised questions and objections to “ Shih Syu”. However, Mr. Chang was blind to them, and even insisted in his viewpoints. Under the chaos caused by warlords and the threat from foreign enemies, Mr. Chang did have his necessary concerns to maintain th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to consolidate the edification of sage emperors in “ Shih Syu”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ystem.

Keywords : Shou-yung Chang 、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 of Shih Jing 、 Shih Syu 、 Mao Shih 、 Che-tung historians 。

壹、張壽鏞生平事略及其《詩史初稿》

張壽鏞（1876-1945A.D.），字詠霓，號伯頌，別號約園，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A.D.）鄉試舉人，次年以知府銜到蘇巡房營任點名發餉，後繼任江蘇仕學館提調、淞滬捐釐總局提調、江蘇海運會辦等職，興利除害，嚴厲懲治舞弊。民國成立後，歷任浙江、湖北、江蘇、山東四省財政廳長以及財政部次長等職，於財政之規劃，頗有建樹。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美國教會在上海所辦的聖約翰大學壓制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師生五百餘人憤而離校，共商自辦學府，推舉張壽鏞為校長，是年9月，光華大學成立，寓有「光我中華」之意。此後數年，張氏親自授課不輟，講稿輯成《約園講演集》、《史學大綱》等書。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光華校舍盡毀，張氏遂於成都籌建分校，使弦歌不輟，直到1945年病榻彌留之前，仍以「復興中華，復興光華」囑咐學子，不幸7天後去世，距抗戰勝利只差一個月。

辦學、講學之餘，張氏也致力於蒐羅舊籍，進行文獻編目以及校勘。其廣集寧波地方文獻，刊刻《四明叢書》，每書皆取善本參校，互異之處，擇善而從，無從校者仍之。每書首末，張氏或序或跋，於編輯之由，刊刻之故，詳為敘述，對保留鄉賢遺著有很大的貢獻。此外，張氏也有不少著作，已刊行的有：《皇朝掌故匯編·外編》40卷60冊（1902 A.D.）、《浙江最近財政說明書》不分卷2冊（1914 A.D.）、《約園理財牘稿》不分卷1冊（1919 A.D.）、《發起江蘇江北沿海信托集團農場計劃草案》不分卷3冊（1932 A.D.）、《約園雜著》8卷3冊（1936 A.D.）、《游蜀草》3卷1冊（1938 A.D.）、《約園雜著緒編》8卷2冊（1941 A.D.）、《約園講演集》1卷1冊（1941 A.D.）、《詩史初稿》16卷首1卷2冊（1942 A.D.）、《史學大綱》不分卷1冊（1943 A.D.）、《諸子大綱》不分卷1冊（1944 A.D.）、《約園雜著三編》8卷3冊（1945 A.D.）。

其中，《詩史初稿》一書，乃張壽鏞研究《詩經》學著作之藍本，是書凡例曰：「參攷之書雖不下百數十種，然究覺遺漏甚多，況以孤陋寡聞，輒欲成一家言，極知貽譏……此為藍本，非敢問世。¹」由此可見，張氏對此著作不甚滿意，因而命名之為《初稿》。至於「非敢問世」而問世，推測乃欲時人糾舉缺失，故其曰：「海內君子，儻蒙賜教，匡正其失，徐圖整齊，一瓣馨香，益深禱祝。²」此種不畏讒譏，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值得今日學者效法。

張壽鏞《詩史初稿》之準則有四：一為「遵序」；二為「宗毛」；三為「依譜」；四為「考史」。是什麼樣的政治背景？什麼樣的學術環境？使得20世紀初期，張氏仍謹守〈詩序〉、《毛詩》、鄭玄《詩譜》等傳統看法，並引用多種史籍來證明《詩經》之事，其寫作的動機，其背後的想法，皆反映民國初期《詩經》學的研究概況，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¹ 張壽鏞：《詩史初稿》，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台中：文叢閣圖書，2009年9月），凡例頁5。

²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5。

貳、《詩史初稿》的寫作背景

清末民初，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士人不斷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反思，表現在《詩經》上，即為反〈詩序〉以及反歷代訓詁所賦予《詩經》權威性的運動。在此之前，〈詩序〉也一直在士人的遵循及批評聲浪中載浮載沉，如：宋代歐陽修《詩本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朱熹《詩集傳》、《詩序辨說》等著作，皆曾全面性的對〈詩序〉提出檢討，林慶彰指出：

此後（宋代以後），《詩序》可說已被廢去。《詩序》雖被廢，但《詩序》所形成的聖王教化觀，在朱子的《詩集傳》中仍處處可見。表面上朱子等人是廢去了《詩序》，事實上，《詩序》的無形影響力仍舊左右朱子的《詩》學觀點。³

朱熹等人雖廢除形式上的〈詩序〉，然而倫理教化解詩的觀念並未消泯。入清以後，乾嘉漢學興盛，〈詩序〉的主導地位再次得到確立，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以及陳奐《詩毛氏傳疏》，皆以〈詩序〉為主要的依循對象。到了晚清，今文經學興起，魏源《詩古微》主張拋棄〈詩序〉，回到三家詩；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以為〈詩序〉乃劉歆所偽造，至此，〈詩序〉再次成了弊履，為士人所鄙棄。由此可見，自宋而降，存〈序〉、廢〈序〉兩派觀點一直喋喋不休，醞釀至民國初年，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反傳統、反〈詩序〉的潮流終於爆發而不可遏止，林慶彰曰：「從民國 11 年（1922A.D.）起，陸續有批判《詩序》的文章出現，一直延續到抗戰期間，批判的文章約有二十餘篇。⁴」《詩史初稿》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所產生的，然而，張壽鏞並未接受所謂「反詩序」的看法，全書凡例的第一條曰：「遵序」，可想而知，張氏不認同郭沫若、鄭振鐸、俞平伯、胡適等人揚棄〈詩序〉，重新詮釋詩旨的作法，因而創作了《詩史初稿》。

張壽鏞之《詩經》學，有其家學淵源。父親張嘉祿，光緒三年（1877A.D.）進士，受同為鄞縣出身的南宋學者王應麟影響至深，嘗語壽鏞曰：

深寧⁵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初，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⁶

王應麟為浙東學派先驅，其為學主張「漢宋兼採」，故《詩史初稿》效法之曰：「是編漢宋並重，漢之不可無宋，猶宋之不可無漢也。⁷」；其主張「經史互證」，故《詩史初稿》以詩講史、

³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貴州文史叢刊》1997 年 5 期（貴州：貴州文史研究館，1997 年），頁 1。

⁴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頁 4。

⁵ 王應麟晚年自號深寧。

⁶ 張壽鏞：〈困學紀聞補注後序〉，《約園雜著續編》卷 2（上海：上海書店，1941 年），頁 23。

⁷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5。

以史證詩；其《詩地理考》全錄鄭玄《詩譜》十首，故《詩史初稿》凡例三曰：「依譜」，即凡鄭玄《詩譜》之說，率皆依循。由此可見王氏經學觀對《詩史初稿》一書影響至深。然而王氏、張氏之說，也有所分歧，如：王應麟《詩考》嘆毛傳、鄭箋獨傳，故廣羅三家詩，以與《毛詩》相證；張壽鏞則獨宗《毛詩》，認為：「所謂魯近之者，且往往與事蹟不合，遑論齊韓。」⁸這意謂張氏雖汲取前輩學者對《詩經》的看法，然而在研究態度上，卻謹守漢儒之說而不肯退讓，這在民國初期反傳統的經學氛圍中，可算是獨樹一幟。

《詩史初稿》之所以「遵序」、「宗毛」、「依譜」，其背後動機，在維持漢儒以降所賦予《詩經》的權威性及道德性，此與張氏身處浙東學派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浙東學派之學術精神，蔡克驕大致整理如下：

浙東史學的精神首推經世致用和民族精神，這在各個時期學者那裏都有提到。梁啟超認為「史學經世」是浙東史學的精神，他說：「黃宗義、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為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清代學術概論》）周予同指出浙東史學派的兩大特點是：「嚴種族之別」和「尊重歷史」。他說：「黃宗義、萬斯同輩努力於宋明末葉掌故的搜輯，都不過憑藉史實以引起後死者的奮發。」這兩大特點就是經世精神和愛國精神。陳訓慈的《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有專章論述浙東史學的精神。他把浙東史學的精神概括為：博約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經世實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門戶與大公之精神。⁹

大致所論，浙東學派之學術，即通過史籍、經籍互證，以喚起士人的「經世精神」和「愛國情操」。張氏之學，同樣循此途徑，其《詩史初稿·自序》引程子之語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¹⁰由此可見，張氏認為「事」與「詩」不可分，必先知「事」，然後才可探求詩之「義」。詩中之「事」，張氏明指即各詩篇之前的小序，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¹¹然而〈詩序〉所述，是否真能代表〈詩〉之本事？答案是否定的！在《詩史初稿》出版前，如：郭沫若《卷耳集》（1922A.D.）、鄭振鐸《讀毛詩序》（1923A.D.）、張西堂為顧頡剛輯鄭樵《詩辯妄》所作的序（1933A.D.）……，皆曾對〈詩序〉的相關問題，提出質疑和反對，然而張氏或視而不見，或雖見仍一意孤行，如：關於〈詩序〉的作者，鄭振鐸、顧頡剛皆以為是衛宏所作，張壽鏞卻堅持是聖人之徒所作，其曰：「詩序之源流遠矣，其非衛宏作班班可考。意者作之于聖人之徒歟！」¹²至於聖人是誰，張氏卻沒給一個明確的交代。

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⁹ 蔡克驕：〈20世紀關於“浙東史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1期（杭州：浙江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3年），頁157。

¹⁰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2。

¹¹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2。

¹²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詩序〉的作者是誰，直接影響到〈詩序〉的地位，更動搖數千年來依附在〈詩序〉解經的倫理教化傳統。在軍閥割據、外敵環伺，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以前，張氏選擇維護禮教、鞏固人心，實有其不得已之處，再加上反〈詩序〉的學者，往往是一味求新，如：1925年胡適發表的《談談詩經》，認為〈關雎〉、〈野有死麕〉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詩；〈小星〉是妓女星夜求歡的描寫。這些無益於社會人心、無助於禮樂教化的詮釋，是張氏所不能接受的。此外，《毛詩》有所謂正、變之說，張氏認為即使身處變局，如：「夫文王固生于紂之世也¹³。」只要能合乎「天理」，就能突破困境，開創新局。故張氏研究《詩經》之目的，在於他認為：「詩者，求天人之應也。¹⁴」也就是《詩》能夠為當世之亂局，找到向上提昇的力量，言外之意，即：文王身處商紂之世，都能撥亂反正，成就二南治世，今日何嘗不可呢？故其「採取記傳，徵諸〈序〉言，竭五載之力，編成詩史十六卷，名曰《詩史初稿》。¹⁵」實有浙東學派喚起士人「經世精神」和「愛國情操」之意。其《詩史初稿》雖「以詩講史」、「以史證詩」然而「史」只是佐證〈詩序〉，其目的在通過史籍、經籍互證，來維護舊有優良文化傳統，以達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乎！」¹⁶的自我抱負。上述為其思想脈絡，學者在責其謹守〈詩序〉、《毛詩》之時，宜就時代背景及學術環境言之，置之於適當地位。

參、《詩史初稿》的全書體例

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 25，影印 1942 年張壽鏞《詩史初稿》之鉛印本，總 475 頁¹⁷。全書分成「自序」、「凡例」、「目錄」、「卷首」（文武周成年表及詩總表）、「正文」（卷 1 至卷 16）等五部分。以下就「凡例」、「表」（文武周成年表、詩總表、詩年表）、「正文」來介紹全書體例。

一、凡例

《詩史初稿》之凡例有七：

（一）導序

關於〈詩序〉的作者，張壽鏞曰：「其非衛宏作，班班可考。意者作之于聖人之徒歟。¹⁸」然此「聖人之徒」究指何人？張氏並未說明。雖弄不清楚〈詩序〉的作者，張壽鏞還是認為

¹³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1。

¹⁴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1。

¹⁵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2。

¹⁶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2。

¹⁷ 自序頁 2，凡例頁 4，目錄頁 4，卷首加正文頁 465，總 475 頁。

¹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研究《詩經》應「以〈序〉為主，採羣說。無背于〈序〉者，輔之。¹⁹」

（二）宗毛

關於三家詩，張壽鏞認為：「所謂魯近之者，且往往與事蹟不合，遑論齊韓。²⁰」之所以獨宗《毛詩》，在於毛氏之傳，既有全書，且大致依〈序〉而有所依據。張壽鏞認為「詩」與「序」之旨意原本是相合的，之所以有歧異，在鄭玄作箋以後，其曰：「毛氏之傳，既有全書，其說又大致依〈序〉而深有所據。鄭康成箋《毛》，偶有異義，轉致抵牾，如〈十月之交〉四篇之類。程明道先生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是編爰以《毛傳》為主。²¹」

（三）依譜

鄭玄所撰《詩譜》，填補了《毛詩》訓釋中只有總序和篇序，而沒有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各類詩之序的空白，意義重大。張壽鏞認為此譜「實遵〈序〉宗《毛》，以意為之者間有之，然亦寡矣。²²」故依循其說。然《詩譜》已有殘佚，故以宋代歐陽修，清代戴震、丁晏、袁鈞、汪龍等人之增補本惟是之。

（四）考史

張壽鏞參考史籍，有一定的順序，他認為《詩經》之事實，與《左傳》、《國語》合者最多，原因在於：「以左史親見國史，《公》、《穀》得于傳聞也，故採《左》、《國》而不採《公》、《穀》。²³」故採證史實，以《左傳》、《國語》為主。其次，張氏也採《史記》之說，凡《史記》所無者，則參照《竹書紀年》之可信者。此外，張氏也參考宋代羅泌《路史》、蘇轍《古史》、劉道原《外紀》、金履祥《通鑑前編》等書。最末則拋棄古書，遷就清儒所考訂者，如：萬斯同《紀元彙考》以及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五）分紀

張壽鏞《詩史初稿》分紀之體例，在於「以紀分其世，以一世為一表，既以詩總表著於卷首，而依詩之原次，更以詩分表編於紀末，而循是編之年月總表，標明風雅頌之體，分表則略焉。²⁴」如：張氏考證《詩經》總歷十六王，故起自文王，終於定王，總分十六紀，其曰：「一世為一表」，乃指每一帝王，有一卷首的「詩總表」以及各卷之末的「詩年表」。參照「詩總表」，可得文王之詩 39 篇、武王之詩 9 篇、成王之詩 55 篇、懿王之詩 5 篇、夷王之詩 5 篇、厲王之詩 8 篇、宣王之詩 30 篇、幽王之詩 46 篇、²⁵平王之詩 24 篇、桓王之詩 43 篇、莊王之

¹⁹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²⁰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²¹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²²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²³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²⁴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4。

²⁵ 頁 11〈詩總表〉計幽王之詩凡四十五篇有誤，當正為四十六篇。

詩 15 篇、僖王之詩 5 篇、惠王之詩 12 篇、襄王之詩 10 篇、頃王之詩 3 篇、定王之詩 2 篇，總 311 篇；參照「詩年表」，可得何詩作於何年，如以〈成王詩年表〉為例：²⁶

元年七月。

二年鴟鴞。

三年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罏 狼跋 有客。

四年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五年離。

六年酌 桓 賁 般 時邁。

七年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既醉 鳧鷖 昊天有成命 思文 生民 噫嘻 載芟
良耜 豐年 天作 我將 執競 武 振鷖 有瞽 烈文 載見 臣工 蓼蕭 湛
露 彤弓 潛 絲衣 由庚 崇丘 由儀。

八年公劉 洞酌 卷阿 行葦 假樂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菁菁者莪。

（六）匯參

所謂「匯參」，即「凡與論世有關者，分別參稽而存其說。²⁷」也就是凡與考證詩歌年代、君王年表有關者，皆抄錄於內，並加上案語。其內容以專書為多，凡穿鑿附會，無關宏旨者，概不收錄。

（七）就正

所謂「就正」，即強調參攷之書雖不下百數十種，然究覺遺漏甚多，望海內君子賜教以匡正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張氏曰：「此為藍本，非敢問世。」之所以「非敢問世」而問世，推測乃欲時人糾舉其失，其曰：「海內君子，儻蒙賜教，匡正其失，徐圖整齊，一瓣馨香，益深禱祝。²⁸」即此之謂。

二、表之體例

《詩史初稿》共有三表，一為卷首文王、武王、周公、成王之年表；二為卷首之詩總表；三為各卷之末的詩年表，茲分述如下：

（一）文武成周年表

²⁶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 158。

²⁷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4。

²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5。

文武成周四年表，所列之史實非常簡略，張壽鏞曰：「意在攷其年齡，非表其功業也²⁹」其所依據之本及所考證各王之年歲，茲列表如下：

年表	依據	年歲
文王年表	金履祥《通鑑前編》 《豳風》、《鄭譜》、《孔疏》 《大戴禮·文王世子》 王肅《金縢注》	庚寅—丙寅，年九十七。
武王年表	《孔穎達疏》、《鄭譜》 張守節《史記正義》 王肅《金縢注》	康丁—乙酉，年九十三。
周公年表	不詳	庚丁—丙甲，年九十九。
成王年表	不詳	辛受—壬戌，年五十。

（二）詩總表

張壽鏞參攷鄭玄《詩譜》、歐陽修《補譜》、李黃《毛詩集解》及諸家校正《詩譜》，以考訂詩歌史實，並按詩篇次第排列成〈詩總表〉，茲整理如下：

君王	風雅頌	篇名	總計
文王	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置、采芣、漢廣、汝墳、麟之趾。	39 篇
	召南	鵲巢、采芣、草蟲、采蘋、行露、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騶虞。	
	正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	
	正大雅	文王、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	
武王	召南	甘棠、何彼禮矣。	9 篇
	正小雅	南陔、白華、華黍、魚麗。	
	正大雅	大明、下武、文王有聲。	
成王	豳風	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55 篇
	正小雅	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	
	正大雅	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	
	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臣工、噫嘻、振鷖、豐年、有瞽、潛、離、載見、	

²⁹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 8。

		有客、武、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賁、般。	
懿王	齊風	雞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	5 篇
夷王	邶風	柏舟。	5 篇
	檜風	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	
厲王	陳風	宛丘、東門之枌。	8 篇
	變大雅	民勞、板、蕩、抑、桑柔。	
	唐風 在共和時	蟋蟀。	
宣王	鄘風	柏舟。	30 篇
	秦風	車鄰。	
	陳風	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變小雅	六月、采芣、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	
	變大雅	雲漢、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	
	商頌	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	
幽王	變小雅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鵲奔、車輦、青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芣、角弓、莞柳、都人士、采芣、黍苗、隰桑、白華、鶉之奔奔、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46 篇
	變大雅	瞻邛、召旻。	
平王	邶風	綠衣。	24 篇
	衛風	淇奥、考槃、碩人。	
	王風	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葛藟。	
	鄭風	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	
	唐風	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	
	秦風	駟驥、小戎、蒹葭、終南。	
桓王	邶風	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匏有苦葉、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子乘舟。	43 篇

	鄘風	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	
	衛風	氓、竹竿、芄蘭、伯兮、有狐。	
	王風	兔爰、采芣、大車。	
	鄭風	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褰裳。	
	魏風	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碩鼠。	
	唐風	鴇羽。	
	陳風	墓門。	
莊王	王風	丘中有麻。	15 篇
	鄭風	山有扶蘇、蓍兮、狡童、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	
	齊風	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	
僖王	鄭風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5 篇
	唐風	無衣、有杕之杜。	
惠王	鄘風	定之方中、蝦蟇、相鼠、干旄、載馳。	12 篇
	衛風	木瓜。	
	鄭風	清人。	
	唐風	葛生、采芩。	
	陳風	防有鵲巢、月出。	
	曹風	蜉蝣。	
襄王	衛風	河廣。	10 篇
	秦風	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魯頌	駉、有駟、泮水、閟宮。	
頃王	曹風	候人、鵲鳴、下泉。	3 篇
定王	陳風	株林、澤陂。	2 篇

(三) 詩年表

《詩史初稿》16 卷，各卷之末有「詩年表」，以注明各詩之時代。其例已經見凡例 5 分紀，此略。

三、正文之體例

《詩史初稿》各卷之首，列諸王之紀，始自文王，終於定王，總十六紀，其內容包含：

(一) 發張氏之議論

《文王紀》起首曰：「考古難矣，而信古尤難，與其信史，毋寧信經，與其信它經，毋寧

就本經之文而信之，以旁證它經，吾知其必有合也。³⁰」此述其信古之標準，為先本經，次它經，最末才是史籍。以《詩經》為例，即先《毛詩》，次《左傳》、《國語》，最後才是《史記》、《竹書紀年》等書。

（二）考年表之詳實

十六王紀內，花了許多篇幅，討論諸王之年表。〈文王紀〉曰：「今欲考文王之事，宜先明文王之年。³¹」由此可見張氏對年表的重視，茲舉張氏考證文王、武王之年表為例：

余爰取吾鄉先生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一書所著，周侯昌之元祀帝乙七祀丙子，周侯發之元祀辛受二十一祀丁卯，及周滅商為武王十三年乙卯，武王崩為武王十九年乙酉，周公旦薨為成王十一年丙申，就此以推，先以文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為準，則文王年二十四生武王，年四十六王季薨，明年四十七嗣周侯位，為元祀與〈無逸〉所謂：『受命惟中身』既相合，而享國五十年，正是九十七歲，其時武王年已七十四，明年嗣周侯位，越十三年滅商，是滅商之日，武王已八十七歲矣……。³²

（三）察詩歌之時代

《詩史初稿》凡提到詩歌之時代，以鄭玄《詩譜》為準，如張壽鏞曰：「據《鄭譜》二南二十三篇，小雅九篇，大雅七篇，都三十九篇。³³」

上述為各紀內容，至於各紀之下，則依帝王紀年及歲次排列（不知紀年、歲次則闕），歲次下有事，事下有〈詩〉、〈詩序〉或諸家之說，再其下有壽鏞案語，如以卷1「季歷配摯仲氏任」之事為例：

1、帝王紀年及歲次

商王祖甲二十八祀依紀元彙考，庚寅歲。

2、事

季歷配摯仲氏任，生昌。詩大明參《史記》。壽鏞案：「許謙曰：『祖甲二十八年而文王生。』見翦商說。」

3、詩

〈大明篇〉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³⁰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13。

³¹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13。

³²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13。

³³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14。

4、壽鏞案語

壽鏞案：「鄭箋云：『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于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

又以「周人作關雎，召人作鵲巢」之事為例：

1、帝王紀年及歲次

闕。

2、事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周人作關雎，召人作鵲巢。〈詩序〉。

3、詩序及諸家之說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范處義曰：「文王未嘗稱王，而太姒曰后妃，雖曰后妃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言后妃。夫人特設此稱，為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朱子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許謙依朱子說。

4、壽鏞案語

壽鏞案：「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韓詩外傳》云……。」

肆、《詩史初稿》的解經方式

一、詳考史實，以史證詩

所謂「以史證詩」，即通過本經、旁經、傳注、史籍等材料，與文本相證，進而考察詩歌本事。此方法可上溯至〈詩序〉，如〈燕燕〉小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毛傳》進一步解釋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³⁴」《詩史初稿》「遵序宗毛」，往往也用「以史證詩」的方式，闡述《毛詩》的倫理教化觀，並指出此教化觀直承聖人之意，張壽鏞曰：

毛氏之傳，既有全書，其說又大致依〈序〉而深有所據。鄭康成箋《毛》，偶有異義，

³⁴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2《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頁77。

轉致牴牾，如〈十月之交〉四篇之類。程明道先生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是編爰以《毛傳》為主。³⁵

同樣以〈燕燕〉為例，《詩史初稿》卷10參考《春秋》、〈詩序〉、鄭箋以與詩相證，其曰：「桓王元年魯隱公四年春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春秋，于是衛莊公夫人莊姜送戴嬀大歸〈詩序〉參鄭箋。邶風有〈燕燕〉詩。³⁶」此外，張壽鏞也引用范處義、朱熹等宋儒之說，反覆述說「衛州吁弑其君完」之事：

范處義曰：「莊姜既無子，莊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桓公立，州吁弑之，戴嬀歸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以見己志。」朱子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³⁷

不論《春秋》、〈詩序〉、鄭箋或是范處義、朱熹，皆引用史實以與詩歌相證，張壽鏞則進一步將「衛州吁弑其君完」之事與詩教之溫柔敦厚作一連結，其案語曰：

楊時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由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之故，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勸勉寡人，可謂終溫且惠也。」詩之教，溫柔敦厚，以先君見答，而能勉寡人，此猶未足為敦厚也。惟其不見答而能勉寡人，非敦厚者能之乎！³⁸

由此可見，張氏雖詳考史實，以史證詩，然而只是通過史籍與經籍互證，來維護依附在《毛詩》之下的聖王教化觀，一些爭議性的文字訓詁、章句訓解則較少涉及，張氏曰：「惟碎誼、單辭、殊體、異字則從略焉，以專書極多也。³⁹」，至於詩歌的藝術表現，更非張氏所關心的範疇。同時期的經學家，如張西堂為顧頡剛所輯鄭樵《詩辯妄》所做的序，指出〈詩序〉有十大缺點，其中如：「雜取傳記」、「傳會書史」、「妄生美刺」、「強立分別」、「自相矛盾」、「曲解詩意」、「誤用傳說」等，皆直指強將詩歌附會史實為〈詩序〉的一大錯誤，張氏不察於此而全面接受〈詩序〉之說，乃為了鞏固〈詩序〉的聖王教化觀，而非以探求詩歌本事為目的。

二、知人論世，考史紀年

《孟子·萬章下》認為尚論古之人的途徑，除了頌詩、讀書以外，還得知人與論世。所謂「知人論世」，也就是先了解前人著書立說的背景，知道這個人的品格風骨，才來批評學說的是非得失，從而避免就詮釋者所處的時代，來指責前人立說的侷限。這個觀念為歷來諸多

³⁵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³⁶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332。

³⁷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332。

³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332。

³⁹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5。

學者所闡發，如：清代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曰：「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⁴⁰」又如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曰：

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⁴¹

張壽鏞受「知人論世」風氣的影響，其〈自序〉指出《詩史初稿》寫作意旨在：「爰本孟子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意。採取記傳，徵諸〈序〉言。⁴²」要了解詩歌創作的背景，進而探求 311 篇之本事，一是就詩歌的「作品之中」以論其世；另一則是藉助「作品之外」的歷史途徑來論其世。換言之，即某詩之世不在作品當中，則另謀於作品之外，因此需要列傳與紀年等與詩篇相關的材料來還原歷史的真相。因此，張壽鏞一方面通過史籍、經籍互證，來維護依附在《毛詩》之下的聖王教化觀；另一方面則參考諸家年表，「如：萬氏之《紀元彙考》，齊氏之《歷代帝王年表》，皆經一再考訂而與清之官書相符者如御批通鑑輯覽及御批通鑑綱目前編，由後溯前，勉求其合，其不合者，別考之。⁴³」考訂出「文武成周年表」、「詩總表」以及「詩年表」，其曰：「今欲考文王之事，宜先明文王之年。⁴⁴」表面上看起來，是從大的歷史架構（年表），關注到小的歷史脈絡（事），再與《詩經》本事相合，實際上則是以〈詩序〉所記載的本事為宗，以史籍及後人所考證的說法為輔，來詮釋〈詩序〉的聖王教化觀。其目的在將 311 篇一一置入諸王年表當中，以符合《毛詩》所謂的「正變」、「比興」、「美刺」之說，進一步為這些兩漢發展出來的聖王教化觀找到周秦的歷史依據。

三、與其信史，毋寧信經

張壽鏞在考古、信古方面，有其先後順序，其曰：「與其信史，毋寧信經，與其信它經，毋寧就本經之文而信之，以旁證它經，吾知其必有合也。⁴⁵」張氏「以史證詩」、「考史紀年」的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是為了闡述經書中的儒家聖人精義。他認為《詩經》經過孔子所整理：「魯頌、商頌，孔子錄之於史者也。⁴⁶」〈詩序〉為聖人所作：「序之作者，其聖人之徒歟。

⁴⁰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11 冊影印清刻本（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卷 1 頁 1b。

⁴¹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47。

⁴²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2。

⁴³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4。

⁴⁴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 13。

⁴⁵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 13。

⁴⁶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 1。

⁴⁷」，聖人之意就蘊含在經書當中，讀經必須讀出聖人所寄託的倫理教化才有意義。

張壽鏞和中國傳統士人一樣，相信政治、社會、道德秩序都是遠古聖君、聖人有意創建，讀經在求聖人之意，而非考史實之真，因此，當「經」與「史」有所衝突的時候，他選擇相信經書，並引用其中的教化之說，來勸勉當世之人，如〈詩序〉言〈葛覃〉為后妃之本，張壽鏞案語曰：

《毛傳》所謂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然則〈序〉所謂在父母家者，言其少成若性耳。班固曰：「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白虎通》，與《毛》合。反觀今世，凡競邪侈而威儀動作之度人多厭之，必其驕縱於母家者矣。曾鞏曰：「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本之不立，其在斯乎。」⁴⁸

這種解經方式背後隱含的意義，在於把經書當作是一種信仰、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這種信仰、力量有其穩定性，不隨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揭示經之本事（在張氏認為是聖王教化），即可上通聖人之意，至於史籍、注疏等，都只是為聖王教化服務，只是用來證明經書所述，將蘊藏在其中的聖人之意給挖掘出來。然而，儒家經典作為後世不斷解釋的文本，必然包含歷代經學家的各種認識，因此，經典的意義實際上存在於後人的理解和詮釋當中，而非固守於經典文字本身。張壽鏞「遵序宗毛」，認為「毛萇最得聖賢之意⁴⁹」，所闡述的，也只是漢代的《詩經》學說，既不同於於詩歌原先創作的主旨，也拋棄後代與〈詩序〉、《毛詩》不同的意見。換言之，張氏過於強調詩歌在解釋權上的一元性，儘管歷代學者對《詩經》解釋分歧，但任何解釋如果與〈詩序〉、《毛詩》不合，則沒有意義。對他而言，《詩經》的文本不是開放的，文字也不是多義性的，有意義的是詩歌背後的倫理教化，只有拋棄歷代學者對《詩經》的不當詮釋，重新體會聖人之意，聖人之道才得以重新行之於世，進而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提出反制的力量，重新找回民族的自信心。

四 雜採諸說，證以〈序〉合

《詩史初稿》凡例曰：「遵序」、「宗毛」、「依譜」，全書雜採與此相合之說，以證漢儒所言不虛，因此張壽鏞曰：「是編悉以〈序〉為主，採羣說；無背于〈序〉者，輔之。⁵⁰」又曰：「參攷之書雖不下百數十種，然究覺遺漏甚多。⁵¹」由此可見張氏蒐羅之廣、參證之博。在史籍著作方面，以《左傳》、《國語》為主，張壽鏞曰：「《詩》之事實，與《左傳》、《國語》合

⁴⁷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1。

⁴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頁21。

⁴⁹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⁵⁰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⁵¹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5。

者最多。⁵²」其次則採《史記》，凡《史記》所無者，採《竹書紀年》。至於宋儒考史之說，參考：羅泌《路史》、蘇轍《古史》、劉道原《外紀》、金履祥《通鑑前編》；清儒考史之說，則參考：萬斯同《紀元彙考》以及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在《詩經》著作方面，《詩史初稿》除了依循〈詩序〉、《毛詩》、鄭玄《詩譜》、《毛詩傳箋》以及孔穎達疏之外，也參考宋儒范處義《詩補傳》、朱熹《詩集傳》以及元朝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其曰：

程明道先生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是編爰以《毛傳》為主，宋儒范氏處義有功于《毛》，朱子雖不宗《毛》，而有取于《毛》者亦夥。許氏謙宗朱，而考證名物獨詳，故〈詩序〉以外，首繫三家。⁵³

此外，鄭玄《詩譜》原本已不可見，所以張壽鏞也參考宋代歐陽修《詩譜補亡》、清代丁晏《鄭氏詩譜考正》等書，詳加考證，由後溯前，勉求其合，其曰：「今去古益遠，求其合轍也益難，姑得其似而已。⁵⁴」

《詩史初稿》曰：「是編重在論世，凡與論世有關者，分別參稽而存其說。⁵⁵」凡與探求《詩經》之世有關的資料，張氏皆抄錄並加上案語，「而于大義尤兢兢焉⁵⁶」由此可見，雜採諸說，乃為闡發《詩》中的「大義」，證與聖王之道相合。

伍、《詩史初稿》所反映的《詩》學觀

《詩史初稿》遵〈序〉宗《毛》，主要依循的是漢儒所闡述的聖人教化觀，此聖王教化觀以三種方式形成：一是背離詩歌文本，將儒學觀念注入於經文當中；二是運用比興，以詩歌作為儒學教化的發言工具；三是操縱美刺、正變之說，賦予詩歌政教倫理的功能。張壽鏞全盤接受這三種方式，因此在《詩史初稿》當中，隨處可見儒學系統的比興、正變、美刺、聖王教化之說，如：關於〈詩序〉的作者，張壽鏞認為是「聖人之徒歟」；關於《毛詩》的作者，他認為「毛萇最得聖人之意」，他將〈詩序〉、《毛詩》提高到直承聖人之意的地位，目的是為了反對鄭振鐸、顧頡剛等人為了切斷〈詩序〉與孔子的關係，直指〈詩序〉為東漢衛宏所作，《詩史初稿·凡例》曰：「〈詩序〉之源流遠矣，其非衛宏作，班班可考。⁵⁷」然而全書卻沒有提出適當的證據來說明〈詩序〉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可見考證事實並非張氏所關心的範疇，〈詩序〉與聖人連結，其背後的教化意義，才是他有興趣的課題。

⁵²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⁵³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⁵⁴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4。

⁵⁵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4。

⁵⁶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5。

⁵⁷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3。

張壽鏞相信〈詩序〉、《毛詩》的倫理教化觀最符合詩歌本事，自從鄭玄箋《毛詩》之後，才使得詩旨曖昧不明，其曰：「獨毛氏之傳，既有全書，其說又大致依〈序〉而深有所據。鄭康成箋《毛》，偶有異義，轉致牴牾，如〈十月之交〉四篇之類。」根據文幸福《詩經毛傳鄭箋》所統計，鄭玄以三家義改《毛詩》者 39 條，張壽鏞獨遵《毛詩》，其曰：「齊、魯、韓三家之言詩，各有師承，然所謂魯近之者，且往往與事蹟不合，遑論齊、韓。⁵⁸」由此可見，他認為鄭箋「偶有異義，轉致牴牾」可能與鄭箋雜有三家詩義有關。此外，張壽鏞認為《毛詩》以降，大量後儒經解出現，使得讀者無法領會聖人之意，這個觀點並不承認後儒對古書的詮釋有助於聖賢之意的理解，細究之則與宋儒以降，提倡不假傳注，直接閱讀經書的方式有關，以清儒崔述為例，同樣認為凡經文皆可信，可疑者全出於後儒傳記，必須直接閱讀經書原文，才能求聖人之意，其曰：

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可疑者，初未嘗分別觀之也。壯年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之六經之精粹也。⁵⁹

又曰：

先君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注，必使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⁶⁰

崔述把不同時代的儒者注疏，都看作是理解經書的障礙，以為只要剔除各種注疏之後，就可以恢復原典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崔述和張壽鏞同樣認為閱讀經書原文，不在文字、章句訓詁的探索，而在聖人之意的探求，至於要探求《詩經》的聖人之意，只有回到〈詩序〉，因此，面對反〈詩序〉的風氣，張壽鏞採取浙東學派通過經籍、史籍互證的方式，來強調〈詩序〉的可靠性，不論是對詩歌本事的看法，或對詩歌背景的介紹，凡與〈序〉相合者，則抄錄於正文當中；不相合者，則拋棄不談，這顯示對張壽鏞而言，〈詩序〉、《毛詩》並不是學術對象，而是一種權威和信仰，他相信遠古聖君、聖人把建構社會、政治、道德秩序的道理，以微言大義的方式，寄託在經典當中，因此理解古書，目的在將聖人之意原封不動地挖掘出來。然而儒家經典作為後世不斷解釋的文本，必有各時代各經學家所賦予新的意義，這些意義所要解決的，往往是新的時代課題，就民國初期而言，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士人不斷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反思，張壽鏞相信浙東學派通過經籍、史籍互證的方式，可以喚起讀書人的經世精神和愛國情操，然而他卻無視於當時的研究學者對《詩經》有新的看法，固執的採取兩漢經學之說，不肯退讓，這就解決時弊而言，操作起來是有盲點的。

〈詩序〉定詩旨的標準，不是看詩的內容，而是看該詩屬於哪個王，哪個風，如：屬於《詩經·周南》、《詩經·召南》的一定是美詩；屬於《詩經·鄭風》的一定是刺詩。《詩史初

⁵⁸ 張壽鏞：《詩史初稿》，凡例頁 3。

⁵⁹ 崔述：〈考信錄提要〉，《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16。

⁶⁰ 崔述：〈考信錄自序〉，《崔東壁遺書》，頁 920。

稿》承襲〈詩序〉的美刺、正變之說，編了「詩總表」，將三百十一篇，一一置入十六王年表當中，然而張壽鏞不像鄭振鐸等人，旨在探討美刺、正變之說是否可信，其總結三百十一篇曰：「美者少而刺者眾。⁶¹」深究其意，乃在勸勉國人雖深處亂世，亦當保存人的價值，以與天心相應，故其曰：「夫文王固生于紂之世也。⁶²」又曰「紂不能合乎天，而文王能之，于是天人應矣。⁶³」其目的在藉古聖先王之事以勸勉今世之人矣！

陸、結語

張壽鏞《詩史初稿》刊行後，即為部分學者所引用，如：卷首之文、武、周、成年表，即被當代學者輯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曰：

如《詩史初稿》就充分體現了先生的漢學功力。此書對古代的《詩》學代表作，如《毛詩》、《鄭譜》、《詩序》及唐宋《詩》注等網羅無疑，加以排比研究，擇善而從，又以自己精到見解按斷。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詩史，填補了中國史《春秋》以前的不足。

64

俞信芳對《詩史初稿》的讚譽，基本上不涉及張壽鏞的《詩經》學觀及創作背景，因此僅有參考價值，不成定論。《詩史初稿》最大的理想，在回復〈詩序〉、《毛詩》、《鄭譜》之倫理教化路線，以求扭轉政治、社會的頹敗風氣。該書參攷之書不下百數十種，然而「宗毛」的同時，卻拋棄了三家詩；「遵序」的同時，卻無視於大環境下的反〈詩序〉運動，之所以將〈詩序〉、《毛詩》作為尊崇和效法的對象，在於張壽鏞認為其中的聖人之道，可以解決當時政治、社會上的困境。林慶彰在談「回歸原典運動」這個課題時指出：

歸納歷次的「回歸原典」，所謂「回歸」，應有兩個意義，其一，以原典作為尊崇的標準和效法的對象，這是因為原典有聖人之道在內，唐中葉至宋初、明末清初的回歸原典，基本上屬於這種類型。其二，以原典作為檢討的對象，詳細考辨原典是否真的與聖人有關，如果無關，這些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麼？⁶⁵

以民國初期的《詩經》學為例，顯然的張壽鏞「遵序宗毛」代表第一種意義的「回歸」；胡適「整理國故」、顧頡剛「古史辨運動」則代表第二種意義。他們的訴求同樣在擺脫後代傳疏的束縛，還原古史本來面貌，然而兩種回歸對《詩經》原貌的認知差距太大，前者認為「回歸

⁶¹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1。

⁶²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1。

⁶³ 張壽鏞：《詩史初稿》，自序頁1。

⁶⁴ 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282。

⁶⁵ 林慶彰：〈對楊、劉兩先生文評的回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頁153。

原典」即是回復儒家的聖人之道；後者主張把儒家的神聖性去除才是回歸經典，值得注意的是，後者在民國初年的回歸運動中一直是主流，然而前者代表傳統意義的經學也並未完全消失，楊晉龍〈〈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簡評〉一文曰：

（林毓生）以為五四新文化人物在「思想內容層次」上固然已經大為改觀，但在「思想模式層次」上則依然「不知不覺地繼續持有傳統的思想模式」，即使是激烈的反傳統人物，因為生活在傳統經典權威勢力下，實際上還是無法擺脫如同「遺傳基因」的傳統之潛在影響。⁶⁶

由此可見，民國初期的「傳統」或是「反傳統」並非一分为二，更非孰是孰非的問題，「傳統」一直以「遺傳基因」的模式，潛在的影響「非傳統」，兩者同樣面對的，是政治社會的困局，是西風東漸的挑戰，是經學逐漸沒落的窘境，直至今日，無論「反傳統」的勢力多麼龐大，我們談論《詩經》仍以《毛詩》為主，仍離不開鄭箋、孔疏以及《詩集傳》等後儒傳疏。舊的封建制度崩解了，新的經學觀仍在建立當中，《詩史初稿》所處在的是一個「典範轉移」的時代，我們不能用舊式的典範來評價它，也不宜全盤否定其成書價值，我們應該在時代背景及學術環境的考量下，給予其適當地位。

⁶⁶ 楊晉龍：〈〈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簡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頁147。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漢)《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2《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

二、近人著作

- 吳 淇：《六朝選詩定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1冊影印清刻本，(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邵東方：〈經義求真與古史考信——崔述經史考辨之詮釋學分析〉，《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1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998年)。
- 金建鋒、馬豔輝：〈論王應麟的經學思想〉，《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4卷11期，(商丘：商丘師範學院，2008年11月)。
-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潘美月、杜潔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二編第十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
-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貴州文史叢刊》1997年5期，(貴州：貴州文史研究館，1997年)。
- 林慶彰：〈對楊、劉兩先生文評的回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
- 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 崔 述：《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張壽鏞：《約園雜著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張壽鏞：《詩史初稿》，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台中：文听閣圖書，2009年9月)。
- 楊晉龍：〈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簡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
- 鄧小軍：〈談以史證詩〉，《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9卷3期，(蕪湖：安徽師範大學，2001年8月)。
- 蔡克驕：〈20世紀關於“浙東史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1期，(杭州：浙江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3年)。

劉柏宏：〈林慶彰先生〈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一文評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

蘇 精：〈張壽鏞在財政、教育與藏書事業上的貢獻〉，《傳記文學》43卷2期（總255），1983年8月。